

鄧錫良

画选



邓锡良画选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人民美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邓锡良画选 / 邓锡良绘. — 北京: 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2.8

ISBN 7-102-02601-3

I. 邓... II. 邓... III. 写意画: 花鸟画 — 作品集
— 中国 — 现代 IV. J2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2) 第045346号

邓 锡 良 画 选

人 民 美 术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市北总布胡同 32 号)

责任编辑: 陈振新

装帧设计: 张晓君

责任印制: 丁宝秀

北京美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2002 年 8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开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32 印张: 5.125

印数: 0001 — 5000 册

ISBN 7 - 102 - 02601 - 3/J.2248

定价: 17.50 元

衣钵在手 成竹在胸

陶 钧

“名下无虚士”，这话从前还不太以为然。近几年，可能是少年轻狂渐退吧，益发体会到这话的分量。

明季大家董其昌，盛年时对自己的书艺非常自负。说过“赵（孟頫）书因熟得俗态，吾书因生得秀色”^①这样似谦实傲的话。到了晚年他一反常态，前倨后恭地说：“余年十八学晋人书，得其形模便目无吴兴，今老矣，始知吴兴书法之妙，每见寂寥短卷，终日爱玩。”^②

可见知人不易，知艺更难。大方之家如董氏亦不例外。这是一个层面。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一些饱学之士，秉异之才，或因时空所囿，或因不事张扬，实则至矣，而名未与归。或晚年，或身后，其作品艺术价值才被人们发现。这样的例子古今中外艺术史俯拾即是。应该是艺术这一特殊领域的特殊现象吧。

笔者无意于此进行铺垫，只是感到对于艺术来说，领略皮毛容易，而相对完整和深入地理解艺术家及其作品，则是一件十分艰难的事，个中消息，非耳食者所知。

应邓锡良先生之嘱，为他即将出版的画集写一篇东西，这个任务曾让我感到惶惑。凭自己的能力，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介入先生的艺术世界呢？况且作序往往是名家所为，由我这个后学晚辈来写似乎未合于“礼”。但邓老不以为然，他认

定我行，带着点艺术家的固执。只能是恭敬不如从命。

邓锡良先生，1928 年出生于河北涿州，今年已是 74 岁高龄了。1956 年，当时就读于北京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系的邓锡良于北京和平画店结识了国画大师李苦禅，进而登堂入室，成为苦禅先生的得意弟子。这段略有传奇色彩的经历，近年在许多报刊上曾被披露，甚至版本不一，细节也略有出入。还是邓锡良自己的回忆最接近实际情况吧：

50 年代北京大学的社团活动都安排在每周三下午。一次，社长、数学力学系学生陈贻迎和地质地理系学生赵延铸等谈起苦于没有老师指点，最好能请名家给讲讲。我便说我见过一位老师，是和平画店的著名画家许麟庐先生的儿子指点给我的。那时我常去那里看画，与许先生的儿子很熟。一天我正在看画，他告诉我：“你看，那就是李苦禅，大写意画家”。以后又多次遇见，就是没敢贸然上前说话。这回我试试看，或许能答应我们的请求！

1956 年初夏一个星期日的上午，我又到和平画店看画，正巧苦禅老师也来了，我立即上前向苦禅老师深鞠一躬，说明想拜他为师，北大美术社想请老师去讲课。苦禅老师慈祥地微笑着，拉着我的手坐下，问了问美术社的情况，慨然答应我的请求。后来我和老师提起那次拜师时，老师说：“吾辈相交游并非偶然事，那是缘分。”^③

关于苦禅先生为北大美术社授课，有一个细节颇使人感

慨。就邓锡良回忆：“苦老完全是尽义务，一分钱的讲课费都没有。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内疚，太对不住老师了。”当时，学生能孝敬老师的是“苦老爱抽烟，每逢授课时，我们就准备一盒烟，讲完课再用学校汽车送苦老回家”。

这些，在我们今天听来，已经是恍如隔世了。

就邓锡良和他的同学们来说，不仅在苦老那里学到了画艺，更体会到了高尚的纯粹的人格魅力。

这是建立在纯艺术层面的师生关系，纯之又纯，毫无功利色彩。这种特定历史环境下的特殊师生关系，为现代美术史研究提供了一个颇有意味的细节。

邓锡良手里，保存着许多苦禅老人的书信，迄未发表，已成为珍贵的史料。其中一封写于50年代的长信，披露了苦老当时的心境。

锡良同志：

来信和美术社同学们来信都接到了，知道您们见了报上关于我的访问和座谈的讲话。同情我、安慰我、惦及我。这样推心热诚，却给我极大勉励与坚决的内在力量。大凡一切学术的发展是曲折性与弹性的，常常在中途上会被风摧雹打。这只是在我們预料的意识上作了准备，迟早是成功的。这就叫“送力”，便是最大的努力，最后的奋斗。一种事业成功与否，最重要的关键即在此点。认清了一切事项，文化、工业、技艺、学术等等，将我们人生澈底下来，便大胆的去作。即便发生偏差、波折，我们的方

向与动机总是不错的,任他们有权威的尽管来摧毁压制,我们的业务即是我们的权威。或在生前,或在死后,早晚会被群众发现知道的,那便是我们的成功与永久的安慰。

“人无品格,下笔无法”……在我卅年左右间,除去在学校教课外,在家还教了不少的学生,其中有生活困难的我常供给笔、墨、纸、颜色等,兼常有经济方面上协助,向来不要什么报酬的。我感觉要报酬不伟大,还浇薄。与我们所学的“画”很支离而且极相反的,不协调。同学们不要以此为怀,大家只顾往前去努力,到成功那一天,那才是真正送给我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珍重礼品呢……

在艺术与人生两方面,苦老的言教和身教做出了杰出表率。也许是性格中都具有的秉正、方刚、率真的气质吧,再加上日常的陶染,邓锡良在画风及性格上都带有苦老的影子。

1958年夏天,邓锡良完成了北京大学的学业即将走上工作岗位,临行前,他去向苦老辞行。——四十多年的时间,足以模糊许多记忆,但有一个细节他永远难忘:并不宽裕的老人从兜里掏出一个布包,从里面翻出仅有的六元钱交给邓锡良,要学生拿去零花,令当时的邓锡良哽咽无语。这个情节也足以说明苦老对邓锡良的看重和情同父子的师生感情。

从那时起直至1983年苦老去世,近三十年时间里,这种师生关系一直保持并不断深化。甚至在“文革”期间,苦禅老人被无辜批斗,以名教授的身份改行看传达室,众多亲朋学生

一时疏远的非常时期，邓锡良仍像往常一样去看望老人，嘘寒问暖，使苦老得到极大的安慰。

据邓锡良回忆，苦老喜食香椿，每年春天，邓锡良都从自家树上摘香椿芽送苦老尝鲜。“文革”中的一天，邓锡良照例把香椿送到苦禅先生家里，苦老默默地看着，半晌说了一句话：“别来了，危险！”师生默然无语。

几十年来师生交往甚为知近，苦老对邓锡良寄予厚望，习作每有所得，苦禅先生便频加鼓励，予以题跋，这样累积下来，同苦老合作或有苦老题跋的画作竟有数十幅。此外，还有大量的苦老亲笔信札、示范画稿，这些已经成为研究苦禅大师艺术和见证二人师生之缘的珍贵资料。

直到苦禅先生晚年，邓锡良还曾接到苦老的一封短札：

锡良弟如晤：

多日不见，近中情况如何，得暇祈来寓面晤为盼。全家安健！

愚兄禅手示七月廿八日

接信后邓锡良以为苦老有什么事情相嘱，匆忙前往苦禅寓所问有何事。见了面，苦老不慌不忙地说：“没事，聊聊。”

笔者曾接览苦老此札，笔精墨妙。与平日风格不同，写得悠游自在，略见闲适心态，人书俱老，叹为五合之作。

昔人评大王书札有“君家两行十三字，气压邳侯十万笺”之说。此作庶几近之。

而“相见亦无事，不来忽忆君”式的师生交游，亦成一段佳话。

苦禅先生去世后,1987年在山东济南李苦禅纪念馆举办了邓锡良画展。一时观者如堵,好评如潮。

在筹备此展的时候,李苦禅先生的夫人李慧文女士找到邓锡良谈及此事,邓锡良谦逊一如以往,说苦老弟子众多,为自己个人举办展览不如搞成联展。李师母郑重地告诉他,办这个展览是李苦禅先生的遗愿,李师母说:“你和他们不一样。”

与其说邓锡良拜苦禅老人为师数十年如一日是学习绘画艺术,毋宁说他首先在苦禅老人那里学到了热情、质朴、端方的人格,以及这人格魅力芊芊乎发诸笔墨的艺术世界。换言之,苦禅老人高尚的品格,已经与其艺术魅力熔铸一炉,难分尔我,相辅相成了。

这是颇具传统意味的话题。

苦禅老人也反复提及:“画如其人,书如其人,必先有人格方有画品。人无品格行之不远,画无品格下笔无方。”

就评论家而言,艺事与人事固然不能等量齐观。而对于具有高度自觉的视艺术同生命的艺术家们来说,德艺双修早已变成一项不二法门的职责和义务,将人生品位视为艺术修炼的一部分。德、艺、人三位一体,孰可权其轻重。抱着这种理想,使艺术精神介入了一种泛宗教式的理想和光辉,昭显着人性的辉煌与力量,从而消解、疏离与超越了艺术领域里的事功精神,提升着艺术家及其作品的格调。

这也是笔者对于人事与艺事关系认识的一点新的修正和心得。

在关注这一层面的同时,笔者还注意到一个史料,即齐白石对李苦禅的评语:“苦禅仁弟画笔及思想将超余辈……其人品之高即可知矣。”也是将艺术与人品并论。这种思想从齐白石到李苦禅再到邓锡良,是一脉相承的。

邓锡良在苦禅先生那里,学到的远远不止于笔墨技巧、艺术理念,而是得到了全面的人格熏染。他的艺术人生,在潜移默化之间,全方位地传承了苦禅先生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理念和艺术精神的衣钵,而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也正是因为无数如此或相近的个案,得以薪火相传,百代不息。

在和邓锡良先生熟识者的口里,常常会听到这样的事情:比如几十年义务教学生画画并资助经济困难的学生等等,这是邓锡良传承了苦禅老人的人格、艺格。应该说近现代画坛,乃至古今艺术史上,还有许许多多类似的例子,这些艺术的求道者们,生命的终极意义已经超乎艺术本身,而是将从艺过程的每一环节都作为修炼身心与情操的重要过程,从而达到技进乎道的境界,完成自己艺术人生的涅槃。

邓锡良先生言语不多,但语词洗练,生动幽默。有这么一个段子,或更可见其性情。

几年前,邓锡良应邀去某地作画,完成任务之余,他抽空为服务员画了几张。这时邀请单位的一位联系人进来,见状说:“邓老您怎么还给她们画画呢?她们可都是合同工。”

势利之极,自然使人生厌。

锡良先生操起画笔问那位联系人:“这画笔是你拿着还是我拿着?”

答曰：“您拿着。”

锡良先生正色道：“那你还管得了我给谁画画吗?!”

事后，据锡良先生说，给烧锅炉的工人都画了。

痛快之极，风雅之极，可以辑入《今世说》。

人格之外，苦禅先生在前文所引长信中重点谈到了“学术”或是“业务”，也就是艺术观念与技法。邓锡良在这方面的刻苦研习与天分，更是得到了苦禅老人的大加褒扬。

1958年，部分北大学生在海淀青龙桥劳动，邓锡良突见一片农田里土豆花开，蛱蝶翻飞，煞是美观。回到燕园，遂以写生稿为基础，创作了一幅作品，得到了苦老的题字鼓励：

锡良弟画土豆花余生平为初见，亦创作也。苦
禅题。

应该说，邓锡良自幼喜爱绘画，有一定美术基础。结识苦老之前，已任学生会美术干事。而1956年拜师苦禅先生之后，得到点拨，画艺更是突飞猛进，仅两年时间，就能画出笔墨、构图、造型都相当成熟且有一定新意的创作作品了。

随后，他的许多佳作上都留下了苦老的笔墨：

烟草花作家多不采入，锡良弟开端，扩大画材领域，甚是。苦禅记。（《烟草花蝴蝶》）

造形用墨均佳。一九六四年观锡良画即题。
禅。（《双鱼》）

略得雪个笔墨意味，继续追求推尘（陈）出新。
锡良作，苦禅题字。（《墨葡萄》）

锡良弟作画日求深进。此幅近作较已升堂矣，

多勉加力。丙辰冬尾苦禅观题。（《墨猫》）

1959年中秋，邓锡良以自造玉兔画稿见呈苦禅先生。苦老见其笔墨雅洁，造型生动，叹为好画。为补桂子一枝并加题：

海市幻景月中宫，时逢中秋分外清。锡良写玉兔余补桂以成幅。一九五九年禅题。

早年，邓锡良以豆角儿为题材创作一幅作品。画面笔法清丽，墨彩温润，构图聚散有致，很好地表现了豆角儿的质感。更以题材独到发前人所未发，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苦禅老人赞赏之余题上：

如此画法内容新颖，笔法亦随之改变。亦创格也，锡良弟多从此着想可矣。辛丑年苦禅题。

邓锡良并不以此为满足，而是更加勤奋地耕耘着这方沃土，他把绘画看做自己生命的一部分。从1956年投师李苦禅先生到现在，将近半个世纪了，他从未放下手中的画笔，创作了数以万计的作品。如今他的寓所里除了必要的生活用具，占据大量空间的，是他积年的画作。平生精力所聚，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创作特点和独特画风，为他赢得了广泛的赞誉，这也是天道酬勤吧。

邓锡良先生的画作有以下几个层面的特点，试分述之。



笔墨，是观察传统国画的一个首要入处，像武林中人所讲，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看似随意的几根线条，承载了

太多的信息,是衡量画家水平的试金石。笔者在讲授“艺术欣赏”这门课时,开宗明义,首先强调的就是:不仅艺术创作需要经过训练,艺术欣赏也要经过训练。中国的书法、绘画尤其如此。实际上,一切艺术门类无一例外。西方人所谓:对于非音乐的耳朵,音乐毫无意义。说的也是这个道理。

邓锡良的绘画继承了李苦禅先生用笔用墨的优点,笔力泼辣而能沉稳、酣畅而能持重。不激不励,线界分明,富于力感与层次。可以用“圆厚拙重”四字概括。

所谓圆,当是藏锋,中锋所使。含蓄蕴藉,符合中国传统的人生哲学与艺术哲学。而一味圆,则易含混,乏精神,所以时有方折、方起之笔破之,以见骨力,成对比。

厚者指笔墨的饱满感、体积感、层次感、血肉感和生命感。扁薄者易觉僵硬、冰冷,而通过恰到好处的用笔技巧界定的点、线、面则可以使人的感受到温热的生命律动。

拙重则是避纤巧、轻滑、浮艳,求其朴质、大气、恢弘。审美倾向如此,虽受其师承影响,更与人的气质秉赋相关。

应该指出的是,上述笔墨效果与追求,无不是围绕物象造型展开的。没有唯美的、孤立的、为表现而表现的笔墨存在。

1975年春天,应邓锡良之请,李苦禅老人写下了一则画论可以与此参照:

写意画亦先重造形,次讲笔墨,因笔与墨是为造形服务。无此二者则不能夸张创作,而且艺术性不能提高。书法属于助画法之重要条件,不可忽略。画者是创造画之主人翁,但不可作画之使用。故创

作之诸条件以及准备修养尝在胸怀,不可须臾离也。

我之作画见的大概如此耳。

锡良弟属写。七五年春即乙卯春月,小兄苦禅记后。

二

邓锡良近年出版有《写意花鸟画技法》、《写意花卉画法》、《写意鱼类画法》、《写意梅兰竹菊画法》、《写意翎毛画法》数种行世,这些画谱类的书籍已发行逾十万册,大受欢迎,为他广结画缘。读者也从这些画谱中,对邓锡良先生的绘画艺术有了一个相对全面的了解。这些画作题材广泛,即以翎毛为例就有:麻雀、山雀、鹦鹉、八哥、喜鹊、乌鸦、鹌鹑、燕子、鸽子、鸭、鹅、鸳鸯、鸬鹚、家鸡、雉鸡、丹顶鹤、灰鹭、白鹭、翠鸟、画眉、鹰、绶带、黄鹂等二十余种。而其中各项又有分别,如:鸡分雌、雄,成鸡与雏鸡;鸭则有近景远景之别;鹰则分墨鹰、白鹰;又分为展翅、休憩、捕攫、栖枝及俯仰向背多种变化,不一而足,窥一斑可知全豹。

这些变化都是建立在大量写生基础之上的,是平生功力所在,蔚为大观。习画者得此之助,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事实上,画谱毕竟囿于格局,不能尽展其平生所学,而展观其积年画作,更可窥其宏大,见其精微。有画册在,读者自可鉴赏,在此不作赘语。

只想补充一点,曾见邓锡良先生现场绘制巨幅《白鹭横江图》,偌大纸面,聚散而成二十余只白鹭,或依水,或振翅,

或低翔，倾时而就，竟然无一雷同，真是擒纵有致，令人叹为观止。

昔年胡佩衡观白石老人作画，慨叹：“万物富于胸中，为画者殊不易也。”今观锡良先生作画，亦有同感。

题材广泛，是邓锡良绘画的一个特点和优长。

三

取材着眼宽博之外，邓锡良绘画的技法丰富，手法多样，也值得称道。

除了泼墨晕染之外，他还擅长单线勾勒的技法。这种类似白描而又较简约的手法，固然是汉唐绘画的精髓和传统。而当这种手法与泼墨在同一画面上运用和展开时，确能收到相得益彰的效果。比如他画群鹰，黑白共处，就有这种妙致。偶尔，他还以更为工细的线描勾勒花朵，配以粗笔的枝叶、石块，也有不错的效果。

此外，指墨、没骨、破墨、积墨、泼彩、破彩、积彩等多种手段都能一一调遣如意，相互生发，这也得力于他的广泛取法。除了全面师承苦禅先生的技法外，他还上溯白石、清湘、新罗、八大、青藤、白阳诸家，不拘一格，而其作品中荒寒野逸一路，最令笔者心折。

广泛取法，转益多师，形成了邓锡良绘画技法丰富、不拘成法的特点，更以此为基础，成就了其题材的表现力。

四

题材、技法之外，邓锡良还注意提炼独特的绘画语言，开拓新的画材，创造自己独特的表现手法。

在拓展题材方面，他注意发掘前人不常入画的物象，以写生为基础，自创一格。从有苦老题跋的玉兔、豆荚、烟草花、巴儿狗、蚕宝宝、夹竹桃到榴花、桐花、苦瓜、猫、鹅都能别开生面。

早年他创作了一幅挂在枝头的青涩的核桃。这个形象与南方的枇杷果相似。他敏锐地捕捉到了二者叶子形态的不同。苦禅老人看过欣然加题：

向画核桃者甚少，锡良作来尚新颖，不知者疑为枇杷，当从叶可分别也。庚子岁末于京都识之。禅。

在这些作品中，《豆荚》是一幅精品。构图上，筐中的豆子与散落的豆荚得轻重开合之变，题材亲切，有田园风致。笔墨温雅精妍，很好地表现了豆子的质感，特别是几枚散落的豆荚，重叠之间颇得妙趣。墨彩的融合恰到好处。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曾提出过一个著名的命题：“美不自美，因人而彰。”他还曾诠释道：“兰亭也，不遭右军，则清湍修竹，芜没于空山矣。”^④

叶燮也说：“凡物之美者，盈天地间皆是也，然必待人之神明才慧而见。”^⑤

这些理论都类似西人所谓：生活中不是缺少美，只是我们的眼睛缺少发现。

邓锡良以他艺术家的一双审美慧眼,为我们撷取了身边的美好事物献于观赏者面前。时下流行一种说法叫:没有人不是艺术家。但艺术创造者所必须的独特的摄取美的能力呢,则又如歌德所言:“它是如此平凡,站在所有人的门口,它又是如此神奇的一件东西,以至于拥有它的人们大多不会使用它。”^⑥

中国绘画特别是文人画的传统,虽然是以临摹入手,但从来有见识的大家无不鼓励人们到自然中去取法并身体力行。

白石老人有言:“凡大家作画,要胸中先有所见之物,然后下笔有神,故与可以烛光取影,大涤子尝居清湘,方可空绝千古。匠家作画,专心前人伪本,开口便言宋元,所画非所目睹,形似未真,何况传神!为吾辈大惭。”^⑦

可以这样认为,从齐白石到李苦禅再到邓锡良,衣钵相传的不仅是单一的绘画技法,更主要的是以造化为本、善于发现、勇于进取的优秀传统艺术精神。

苦禅老人的哲嗣李燕先生在谈到邓锡良的绘画时说:“邓锡良运用苦禅大师的艺术思想和笔墨技巧,画着自己的生活体验和生活素材。”应该说是恰如其分的。

除了画材上别开生面之外,即是一些前人或时人已有表现成法的物象,邓锡良也别出心裁,努力经营自己的独家表现手段。

他笔下的白鹭,一反常见的泼墨加勾勒的写意技法,以淡墨单线写其轮廓,并概括头、足、羽翼,达到了以少少许胜多多的效果。这简逸的笔墨,更体现出轻灵、飘逸的活泼感,很